



盧山楓

王國紅攝

二〇一二年是著名文學雜誌《收穫》創刊五十五周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收穫》雜誌社、巴金故居、上海作家協會邀請國內著名作家、學者集聚上海，在雜誌的誕生地——鉅鹿路六百七十五號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活動。在紀念會上，李小林對王安憶說了一句「真高興，今天是一個純粹的文學的聚會」，王安憶又把這句話轉述給了滿座的作家、散文家和評論家們。孫顯說，假使《收穫》也刊登有商業合作性質的「報告文學」，假使《收穫》的封二封三也有長期合作的廣告客戶，假使《收穫》的版權頁上也出現非文學中人的名字……「純粹的文學的聚會」就不可能實現。



純粹的文學的聚會

遐 迹

正如孫顯所言，「僅僅是堅持從來不登廣告這一點就彌足珍貴，全國沒有幾家文學期刊能守這份清貧來維護文學的純淨品質。」多少年來，一棟小樓上的幾個堆滿書的房間，幾個一編稿子就痴迷、興奮的編輯，維護了文學期刊最寶貴的東西：標準。多少年來，《收穫》拒絕了無數次利益的誘惑，堅持「做最好的作品」，讓《收穫》聲名遠播。在純文學市場式微的今天，《收穫》不僅擁有比較多的訂戶，還兩次獲得出版界最高榮譽——中國出版政府獎，三次被認證為上海市著名商標。一個文學期刊能做到這份上，《收穫》的紀念活動能搞成「純粹的文學的聚會」，不由得讓人肅然起敬。

五十五年只是歷史一瞬間，但對於《收穫》來說卻是充滿了風風雨雨，絕不是一句「不容易」就能概括得了的。在純文學市場日益萎縮的今天，《收穫》作為一本大型純文學期刊，不僅沒有被市場整垮，相反在市場博弈中勇立潮頭，恰似一面飄揚的旗幟。如今作為一本純文學期刊，能夠勉強生存就很不錯了，而《收穫》自一九八六年第一期開始自負盈虧，沒有撥款，不刊廣告。這樣一本不媚時、不媚俗、拒絕商業化的純文學期刊，能夠成爲一面飄揚的旗幟，這如何發展和繁榮文學期刊和文學事業的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範例。筆者認爲，《收穫》的成功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始終把作品當回事，二是始終把讀者當回事。作品是文學期刊的生命，沒有好作品，期刊不可能有生命力；沒有讀者，文學期刊是活不下去的。中國十三億人口大國，總有優秀期刊的一席之地。鍾紅明曾說，「以穩定的作品質量鞏固讀者的信任，以優秀的文學作品維護品牌的聲譽」，這應是《收穫》成功的經驗吧。

在這個物慾橫流的時代，《收穫》的堅守讓我們佩服讓我們尊敬。雖然社會在變，但格非和蘇童異口同聲地表示不希望《收穫》在這個時代去主動謀求變化。格非說：「你想着去適應社會，只會疲於奔命；應該固守自己的準則，堅持文學理想和標準，把最好的作家聚攏在你的旗幟下，讓你來定義文學，引導文學的進步。」蘇童說：「《收穫》的固守是一種格調，形成了中國當代文學的標準。」我們不反對《收穫》也與時俱進，但前提是要爲讀者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糧，要不斷地發展壯大純文學市場。期待《收穫》越辦越好，期待《收穫》受到更多讀者的喜愛。

藉此機會，再簡單講一講其他一些發言人的「身價」。在我國，中央各部委的發言人，大多與外交部一樣，爲副局級（相當於省裡的廳級），內地會館名一時的鐵道部原發言人王勇平，卸任時的職務是該部「宣傳部部長」（司長）。我曾注意到，公安部、科技部發言人的級別略高一些，爲部領導成員。外國的部一級發言人，也大多爲中層負責官員。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爲助理國務卿級別。現任發言人是在紐閣，近來她因釣魚島問題頻頻「出鏡」，屢屢露出一副「無魚島問題、一罰款」的假相，卻難以掩蓋美方袒護日方之實。美國白宮發言人的身價要高一些，爲部級。俄羅斯也設總統發言人，譬如，爲部級。有些國家發言人的身份就更高，譬如，一年多前，利比亞原最高領導人卡扎菲的發言人易卜拉欣，頻頻用一口流利英語就卡扎菲的「戰局親信」。日本對外發言卡扎菲的「戰局親信」。日本對外發言卡扎菲的「戰局親信」。日本對外發言卡扎菲的「戰局親信」。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子夜零時二分（北京時間），戈爾巴喬夫突然通過蘇聯中央電視台，辭去「蘇聯總統」一職；零時十分，蘇聯國旗（亦是「蘇聯總統旗」）從莫斯科克里姆林宮上空慘然落下，俄羅斯三色旗隨之升起。此種五十六小時，我從駐蘇聯大使王蕪卿那裡得知，蘇聯時視預將駐特大使王蕪卿立即向錢其琛外長作了彙報。從二十五日晚九時起，我就一直坐在外交部蘇聯司電視室等著看直播。一聽到戈爾巴喬夫宣佈「退位」，我便立即打電話向正在中南海辦公室的錢其琛彙報，他淡淡地說：「此事早就料到了，但比預想的時間來得要快！」當我向外長報告克里姆林宮上空「易幟」後，這位外長只說了這麼一句短話：「立即準備彙報提議」。

劉震雲的結婚說

蕭 飛



如是見

作家就是作家，比喻總是那麼地精當。在莫言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之後，有記者追着作家劉震雲問他的感想。正面的評價還是有的，否則會被人猜測了什麼，但問得多了，讓誰都會不耐煩。這時的劉震雲就說了一個比喻，說「莫言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就好比我的哥哥新婚進了洞房，我的哥哥進了洞房問我的感覺？我有什麼感覺呢？我也不知道我該怎麼感覺！這樣的回答就很有點不搭。要問感覺，當然應當去問莫言，而對別的作家，他可以說出很多，但卻並不用，因為並不是別的作家進了這個「洞房」。非要讓別的作家在莫言獲獎之後說出許多歡呼雀躍的話來，就沒意思了。」

這讓我想起著名學者錢鍾書說過的一句話。一個美國女士讀了錢鍾書寫的小說《圍城》，十分佩服，非要登門拜訪。錢鍾書天生是個不愛給母親的主，便在電話中說：「假如你吃了個雞蛋，覺得不錯，何必去認那個不愛給母親的主，現在，非但莫言成了那隻「母雞」，連他其他很多的作家也都不免免，均成了「母雞」。作家要用作品說話的，得了獎的也未必作品就一定好，用王蒙的話說，每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說，賣得不好也多了去，至於沒有讀過這些獲獎小說的人就更多，大家也就是幫助高興，實際上真不必把這事往爲國爭光上靠。」

我本以爲，莫言獲獎，可能會有效地促進人們對文學作品的關注與喜愛，進而產生全中國當代文學的總體思考。畢竟，我們出現了那麼多的文學作品，其創作流派、創作風格如何，中國當代文學的現實主義思想以及對於匡正時弊的作用發揮得如何等等，但結果卻不是，人們更多的是對於莫言秘聞的興趣，以至於他在山東高密農村的房屋也成爲人們熱烈的談資，更應當是從小說家的層面討論莫言作品的分析，因爲莫言的小說就是每個人都可以走進去看，不像「哥哥的新房」，別人進不得，其感受也只能由哥哥去談。顯然，記者們和無數的讀者對小說說了什麼並沒有多少興趣，他們更希望聽到哥哥進洞房後的感覺。

這樣的結果導致關於莫言八卦的新聞不斷出現。有人在熱烈地討論莫言所獲得的獎金究竟能在北京三環附近買多大的房子，據說只能買一百來平米。商人陳光輝坐不住了，表態可以在北京贈送一個大套。頒獎禮前夕，人們更熱衷於莫言將會穿什麼樣的服裝去瑞典領獎。莫言本人想入非非，傾向於穿燕尾服，跳華爾茲，據說之前一直在恐補，以免到時候有人邀請跳舞，自己卻不會有失禮節。畢竟國人很講究面子，所謂窮家富路，但是很多人不同意，他們認爲莫言到那外邊領獎就應該穿民族服裝，譬如唐裝、長衫、中山裝，乃至漢服。有人乾脆將莫言的照片印出各種服裝裝的模樣供人們欣賞，就連一些很有分量的電視媒體也樂此不疲。這讓我想起來，梅蘭芳穿女裝到台道這「萬福」，卸妝後又穿著長袍馬褂到台前含笑鞠躬。女觀衆這才知道梅蘭芳原是個「蜜絲特」，非要徹底看個夠不可，苦苦央求他再穿西服給她們看看，以到秩序大亂，分明不是來看戲，而是在「鬧新房」。倘若莫言去領獎時也玩起服裝秀，那就不像是去領獎，正像梅蘭芳不像演戲一樣收不了場，可惜的莫言沒有梅蘭芳那樣迷人的身段。

王蒙在莫言獲獎前的很多地方說過一句話，「諾貝爾文學獎好，不如文學好」。他以為，文學獎可以很熱鬧，很光榮，一下子就身價十倍，身價百倍，身價千倍，文學人與文學獎都是世俗的活人與他們的活動，而文學崇高如雲霞。莫言獲此殊榮，我們當然要去了解他，但絕不是只去關注作者和獎項，弄些花邊新聞作爲茶餘飯後的談資，而應理智地挖掘其創作思想，引導人們去關注文學，閱讀作品，養成全民讀書的風氣。

如此繁華如此夢

段懷清



文化 經濟

整個十九世紀，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重要的一百年，由此也拉開了近代以來直至當下中國現代城市化大發展的序幕。而這輪城市化大發展，依然具有因爲對外工商貿易而興起的特點，與內地城市多因爲政治移民以及財富轉移等原因而興起似有不同。

就其所開設欄目內容而言，亦充分顯示出近代都市公共言論綜合駁雜之特點，其欄目設首篇（政論時評之類）、笑林、博物志、官場現形記、春江花月、各地芳訊、粉墨叢談、滬濱聞見、海外奇談、京華新語、寓言、談叢、翰墨林等，是一份帶有鮮明文人風格同時又兼顧都市新市民日常生活趣味的娛樂消閒性報紙。通過這樣一份報紙，讀者大抵可以窺見上海都市的諸多側面。

但報紙對於人與事的報道終歸平面，且難以鮮活。或許與此有關，晚清以來直至民國初年，此類報刊的編輯，多亦爲小說一類著述之寫手。因爲有報刊編輯對於時新之敏感，因此，這些寫手的著述，多以時代關注爲對象，其所著述，亦多能成爲暢銷書。譬如海上漱石生的《海上繁華夢》，據其自己所言，出版廿年間，是「年必再版，所銷已不知幾十萬冊。」

爲什麼《海上繁華夢》會如此暢銷，或許從一則考訂筆記中可見一斑。蔣瑞藻的《小說考證》（續編）中，有《海上繁華夢》一條，文字不長，摘錄如下：

專寫妓院情形之書，以《海上花》爲第一發見，繼此而作者，爲《海上繁華夢》。著者上海孫玉聲君家派。君家素豐，少時獵豔尋芳，大有杜牧揚州之概。當筵買笑，揮霍甚豪。故由院名花無不歡迎恐後。孫君又自創《笑林》報館，青樓中人，苟



長江鄞縣一景（攝影） 李 波

俄羅斯人口問題

真 如



域外 漫筆

當今世界，人類面臨諸多生態問題，不少正在制定和實行人口節育政策。而俄羅斯卻大力鼓勵生育，提高人口出生率。這是爲什麼呢？原來從沙俄到蘇聯，再到俄羅斯，近百年來出生率始終不高，人口自然增長緩慢。到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先是農業集體化運動，後是衛國戰爭，人口驟減。僅戰爭就有二千多萬人死亡。當時蘇聯政府鼓勵國民多生多育，設立「英雄母親」的榮譽稱號，並給予物質獎勵。特別是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由斯大林直接下令，對單身者和人口少的家庭徵稅，無子女的人得把工資的百分之六上繳國家，這樣人口才開始緩慢增長。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由於社會觀念變化、職業婦女增長、社會老化、高離婚率、自殺及酗酒致死等多種原因，俄羅斯出現人口負增長。俄羅斯幅員遼闊，面積一七零七萬平方公里，而人口不到一點五億（平均每平方公里不足十六人），並逐年以幾十萬乃至近百萬的數字銳減，問題嚴重。

俄羅斯的人口下降還帶來另一結果：勞動力匱乏和國家負擔加重。據報稱：目前是一千名勞動者供養六百名退休人員，到二〇三〇年，數字將轉過來（600：1000）。俄適齡勞動力正以每年減少四十萬的速度下降。爲此，二〇一〇年前副總理兼財庫庫德林就提出延長退休年限問題。目前俄退休年齡爲男六十，女五十五；有些部門（強力部門、高危行業和教師）還可能提前退休，導致養老基金會不堪重負。俄衛生與社會發展部認爲亟需延長退休年齡。財政部建議自二〇一五年起逐步提高退休年齡，終極目標是不分男女都升到六十三歲。

據有人在俄羅斯的親眼所見，連教堂也在鼓勵生育政策。有神甫在布道時聲稱：「我們信奉上帝的人，要多多生兒育女，這是上帝賦予我們的責任……」而教堂神職人員正不斷向人派發刊物《接納生命》。



續 紛 華 夏

外交部發言人是一人還是「一人」？這個問題，讀起來有點晦澀，其實人家想問的，卻很簡單：「外交部發言人」，此官，是一個個體，還是一「群體」？我認爲，既是前者，也是後者。

現在再回頭來講講前者。外交部發言人當然也是一個「個體」。如何把這個「一言」發「一」出去，而且還要「發」得精彩，靠的是一個個具體的人，靠其智慧、才華、學養、判斷能力、應變本領、駕馭現場的功力。前述種種本應之取得，顯非一時「役」之功，乃日復一日那「釘」一錘錘煉、一點一滴積累之果。就拿發言技巧來說吧，學問就大得很，須不斷學習、練習、悟、用。新聞就大得，用反問來解困，甚至陷問者於尷尬之地。時任全國政協主席的李瑞環，在這方面給我們提供一個經典範本。有一次，他在香港公開發表講話，強調港人團結的重要性。於是，有位記者便問：「這是否意味着一香港人不夠團結？」這位中國領導人隨口反問：「我祝你身體健康，是否意味着你身體不夠健康？」這是個神來之問，它立即引發全場熱烈的掌聲。

外交部新聞發言人

李景賢

有人認爲，外交部發言人應該是個「全才」，此話不無道理。記得有位外交部領導說過，在我們外交部，選個司長易，挑位發言人難！我國外交部發言人中，我認識的、讀過的、聽過的，約有二十位。對他們的一來龍一與「去脈」，我也略知一二。據我粗略統計，約有百分之六十五發言人來自我的母校——北京外國語學院（今「北京外國語大學」），他們在該校本科、研究生班、進修班修完了學業。約有百分之八十發言人的第一工作外語是英語。這些人成爲外交部發言人，全都是外交部地區業務司和駐外使領館的骨幹——高級外交官。他們從外交部發言人崗位卸任後，日後都仕途順暢。衆所周知，錢其琛曾任黨和國家領導人。李肇星官至外交部長。齊懷遠等七人後來成爲高級領導幹部的搖籃。」